

中華叢書

廣東書院制度

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

中華叢書

廣東書院制度

劉伯驥著

序

中國故制書院組織，集文史研究之長，爲專門講習之業，與希臘「亞加登美」（Academia）「利凱央」（Lykeon）相類似。自宋迄清九百餘載，書院庠序，偏於郡邑，爲國家教育之所，與今之學校同也。有時大師碩彥，講學其間，如宋之白鹿、嶽麓，明之東林，清之南菁、尊經、學海、萬木，皆教育英才，主持風會，則柏拉圖之「亞加登美」，亞里士多德之「利凱央」，不得專美於希臘二千年前往史矣。中土書院之興，亦近千年，鮮有專書，詳其沿革。劉君伯驥，爲中山大學文學院高材生，好學深思，從愚受課，輒以研幾之勤，蔚爲探本之學，述廣東書院故制沿革，爲畢業論文，考績之優，越其儕輩。其爲書雖以粵省爲立論中心，而旁徵博引，沿流溯源，兩宋以來庠序教育咸萃於是。方今海夷入寇，中原板蕩，宗國文物，日以陵夷，劉君此編，詳述故制，尋兩宋以來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勵民族復興之心，作新邦建設之助，倘亦爲談抗戰教育所不可廢者與？因述數言，弁其卷端，以資學者考覽焉。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十七日，吳康敬軒敍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時去蘆溝橋發難，逾十月矣。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起源與變遷 ······ 一三

第一節 宋代書院 ······ 一三

第二節 元代書院 ······ 一七

第三節 明代書院 ······ 一九

第四節 清代書院 ······ 三八

第三章 分佈的形態 ······

第一節 歷史性分佈——宋代元代 ······ 七五

第二節 地理性分佈——明代清代 ······ 七九

第四章 院舍**院舍**

八五

- 第一節 院式 八五
第二節 環境 一〇一
第三節 建築 一〇四

第五章 行政及組織

一一一

- 第一節 設立 一一一
第二節 組織系統 一三三
第三節 啓館散館 一三九

第六章 經費

一四一

- 第一節 來源 一四一
第二節 支付 一八一

第七章 師生

一八七

第八章 課程與訓導 三〇一
 第一節 課程 三〇一
 第二節 訓導 三四九

第九章 書院制度在社會的地位 三八一

- 第一節 學制上 三八一
 第二節 學術上 三八五
 第三節 政治上 三八六
 第四節 心理上 三八七

第十章 書院制度之沒替 三八九

第十一章 結論 四〇三

廣東書院制度

第一章 緒論

書院制度，在中國教育史上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中國過去學制，唐宋以前，只有所謂國學（太學）鄉學（小學）之分；而鄉學之中，又有所謂黨、庠、術、序之別。其後國學分館與科，鄉學又分爲府、州、縣的學校。不過這時所謂學校，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學校教官，只亦課而不教。因此宋代有三舍之法，明初有六堂之制，無非想從教士上着想，以補其空泛之弊。但這兩種辦法，當時卻有流弊，未幾亦歸停止。書院制度，在此期中便應運而興，爲補學校所不逮的。像明王守仁萬松書院記說：『惟我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而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

明黃泰泉論書院也說：

『夫太學之教行，而成人有德；小學之教行，而小子有造，則亦何賴於此？惟夫學校教導無實，講學既廢，修學奚由？邢邵謂此何異兔葵燕麥，則夫別設書院，以延名儒淑子弟，又焉可無哉？』

書院既然負教的使命，所謂教，就是以『淑子弟』爲務。『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荒，學以養之，書院以萃之，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註一）當時學校只有課試選廩之責，然而『儒學諸生與司鐸往來頗疏，或有因試事而數月一見者矣，或有路遠而終歲不得一見者矣。若夫義學（書院）萃師徒於一堂，晝有講，夜有讀，講業請益，訂期角藝，無風雨晦明之間，有賞奇析疑之樂。此義學之設，其有裨於生童，與儒學並重而不可缺也。』（註二）因此對書院的期許，『凡民俊秀，得以擔簦而負笈，執經而問難，狂簡獲裁成之益，事言有就正之資。或朝販賣而暮洗腆，或出負米而入橫經。有志之士，咸登理學之堂，相與變化氣質，開拓其心胸，追琢其文章，切劘其德行，人文盛而遠大可致。』（註三）

因爲書院的本身任務能够確定它的存在，所以宋明書院雖然沒有列入教育系統之中，而其講學風氣，流被所及，隱然佔當時教育上學術上之重心，這種非成文的制度，給與士子的影響，確比學校來得大。而且當時在書院講學的多爲知名之士，其講學宗旨爲理學，儼然有宗教的精神。尤其自明代嘉靖以後，理學特別發達，理學名儒固然爲着講學的熱心而努力創設書院，同時州郡官吏爲着廣頒政教而也建立書院以爲朔望的宣講。所以書院創興便變成這兩種並行性質，尤以後者的數量爲最多。不過書院講學的內容，仍以前者爲代表；而前者之中，又以南宋四大書院（尤以朱熹白鹿洞書院）的規制爲依歸，歷元、明、清三代，沿襲而不變。從這裏看來，書院不只爲補學校之不逮，而且與理學還互爲表裏。我們看自宋、元、明、清歷七百多年書院制度相沿不變，必須同時看出理學風氣亦經此悠長期間而弗墜，實有互爲因果的關係。

但是，到了清代，書院性質卻和前代略異，無疑山長講學，仍揭闢、閩、濂、洛之學爲宗，而其當時趨向，一受於順治年間藉口結黨遊談的禁抑，再受了乾隆九年禮部議覆書院月課試仍以八股爲主的限制，於是由前代私營自由講學之風氣，一變而爲官立的督課之定制。所以那時書院從其形式上看雖然有些和宋、明書院的相像，而考其實際內容，已轉爲清廷範鑄治術人材之所在。這種書院，其後又不免產生流弊：

『今之書院猶兔絲燕麥耳，專求舉業事帖括，竊取青紫，氣驕意盈；語以聖道，墮植索塗，茫然罔據，爲可慨也！』（註四）

不過我們要明白，清代書院所發生的流弊，學者們雖然常常歸咎於理學的空疏，毋寧爲清代奴化教育的惡果，因爲這時書院已經脫卻其前代真實的講學精神，而流於斤斤以貪圖科舉的虛榮心理爲駕，這是教育政策的錯誤，而不關書院制度本身的問題的。

廣東書院，最初爲南宋嘉定間之禹山書院，以前雖然略有書院之名，但差不多爲一種書舍或生祠的性質，不一定是講學的。自宋嘉定年間起至清光緒末年止，廣東書院，實有七百年之歷史。在明以前，廣東書院的規模確比北方各省的差得遠；但自明以後，無論質量數量總有相當的發展，事實上，明代廣東幾位理學大儒，不唯廣東學術風氣受其涵煦溉濡之功，而北方各省大書院亦受其影響，像陳白沙之講學於白鹿洞書院，湛甘泉之講學於新泉書院，在學術界勢力，與王陽明能互相颉抗。因此廣東書院在這時候便特別的蓬勃起來。試就探溯廣東書院之歷史演變的過程來說，可以分做四個時期。

(一) 開端時期 自南宋嘉定間（公元一二〇八）至明弘治末止（公元一五〇五），二百九十七年之中書院量數甚少，正式開講的書院，除幾大府略有創設外，其餘郡邑，極少顧及。像李見羅萬曆二年在南恩州（陽江）建書院，當時大夫曰：『學且缺，焉用此？』這可知在萬曆前書院尙不爲粵人注意的情形。這個時期，書院一方面固然有些是爲地方名儒或官吏所倡創，然而其直接間接的影響，厥爲謫宦。當時謫宦雖然不一定開設書院親自講學，然而其流風餘韻，給與書院創興的動機及書院講學的宗旨是不少的。這時期中，又可分爲三小段：第一段爲南宋時代，這時廣東書院初興，寥寥可數，僅具雛形，而且多數還是屬謫宦祠性質。第二段爲元代，這時雖列爲官立，但數量增加仍很少，只沿襲些宋代的間有略爲增添而已。第三段爲明初，書院沉寂得很，卻以社學較爲興盛。

(二) 創興時期 自明正德初年（公元一五〇六）至明末隆武五年（公元一六四九）止一百四十三年之中，廣東書院漸次發達。尤以嘉靖萬曆兩代爲盛。雖然經過嘉、萬間三次的摧毀，然而壓力稍去，又立即恢復。其發達原因，就是那時廣東理學風氣盛極一時，湛王之學，分門立戶，各設書院。故書院講學，亦居然分爲兩大派別：在韓江流域，揭陽明之學，主之者爲薛中離。在珠江流域，揭白沙之學，主之者爲湛若水。兩派之中，以後派的勢力爲大，故所創書院亦最多。同時官吏亦多是理學門徒，到處倡創書院，一方面以紀念地方先賢或流寓謫宦；一方面亦爲宣崇正學，各立師承，以標其作官作師之旨。但是到了崇禎年間，書院又復沉寂下去，其原因就是受當時社會政治紊亂的影響，同時還是人亡政息的緣故。

(三) 變態時期　自清初順治七年清兵定粵後（公元一六五〇）至嘉慶末年（公元一八二〇）止一百七十年當中，書院起了一種變態：其優點是規制確定，量數增加，其缺點則為減卻明代自由講學的風氣，而干涉的競求於制藝；減卻士子追求心性修養的傾向，而流為卑鄙的局促的仰慕於科舉的虛榮。這種變態，是起於政治上的影響。其中又可分為三小段：第一段為順治、康熙及雍正初年，這時對過去書院結黨講學的懷疑，因此會壓抑書院創建，雍正初年，更把書院改為義學。所以這期雖有書院的名稱，也要以所指定義學的準則為實。並且清兵入關屠殺的利害，一紙詔令，比嘉靖，萬曆間權臣的矯詔來得有力，因此書院不能不變態的來應付，過去的精神無形中消沉下去。第二段為雍正末年至嘉慶初年，這時因開放與獎勵的緣故，書院便蓬勃而興。但書院內容，已由私營的轉為官立的，由自由的轉為干涉的，由理學的轉為制藝的了，所以士子入學與山長開講不能不兼及，甚至或全部專注於章句聲律之學，清廷對士子羈縻的目的，便已完全達到。所以至第三段時嘉慶末年，書院遂名存實亡，士子困於四股八比之中，而白首童生咷嚦不肯去者，不過為冀圖一兩幾錢膏火之費。因為內容既然空疏，士子入學，流為虛偽，雖有三數山長，兢兢以重器識倡心性為言，亦只成鴻夢幻想而已。

(四) 革新時期　自道光六年（公元一八二六）阮元創建學海堂起至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詔罷書院止共七十五年，在此時期，書院從內容上大起改變，故名之為革新。從前書院課程只為制藝，學術風氣很薄弱，理學旗幟，又屬空疏。阮文達以其浙江詁經精舍規制，而創立學海堂於廣東，一以經史為主，提倡實學，廢除章句課試，改院長為學長，開新式書院之先聲。其後菊坡精舍、五

公精舍、擎經書院、崇實書院等相繼而興。其餘舊式書院，亦多月加古經一課。最後張之洞開創廣雅書院，分爲經、史、理、文四科，制度更進一步。因爲自道光以後，歷受外人侵略，文化風氣，頻受刺激；而且自光緒以後，外人侵略的程度加深，文化思想的動盪，把書院抱殘守闕的態度，給以很大的打擊，於是富國強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呼聲，差不多爲國人共同的心理之表現，書院內容不能不改變動向，兼顧實學。因此掌故、史、輿、曆算等學科，增入課程之中。故此時期，書院內容和明代更差得很遠，可以說爲新學制的嬗蛻時期或先驅時代。

從上面演變的過程來看，知道書院變革的動力，是根據其學術、政治、社會的背景爲轉移；尤其政治經濟條件，決定書院之力量更大。像清代書院之飛騰突變，與其當時政治經濟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在清中葉以前，中國社會以小農業爲主要生產方式，雖然明末廣東已受西洋商業資本的流入，而且元明兩代中國商業資本亦較清初爲發達，但其社會主要的經濟形態，依然穩定於小農業配合家庭工業之中，大同小異，所變動的很少。而書院制度，恰建築在這個社會基礎之上，故其形態歷七百多年之久，還是一脉相承沿襲不褪的。普通來說，書院制度好像跟着其政治上及學術上的動向爲大，所受於社會心理習慣或經濟條件的影響似乎較小，其實我們如果從書院講學的內容來看，可以探測當時社會心理的趨向；更從書院膏火制度或設備實況來看，可以反映當時經濟力量的情形。廣東書院在地理上的分佈，知道富庶的郡邑比較發達；而歷史上的沿革，清代書院設備，比明代的爲優。這因爲廣東在清代與西洋商業資本接觸後資本流動力稍大，因此書院經費，易於籌集，而書院創興，亦更爲發達的。

更進一步說，經濟條件決定書院的存在，確爲當時的事實。在清代中葉以前，書院經費之來源，田租一項爲最高；然而自中葉以後，受西洋經濟的影響，商業資本，逐漸發達，故經費來源之種類，比從前爲複雜，普通由田產的設置而傾向於商業資本之利用的爲最顯著。並且自明清以來，書院田產往往因豪紳的吞蝕，經過相當期間，憑據不存，損失殆盡，於是膏脩弛罷，弦歌消歇，書院常常因而廢圮。這樣說來，政治或學術的影響，只能支配其外在的形態，而其實際的決定本身之存在，仍以當時經濟背景爲最重要的。

其次，還應明白決定書院外在形態之政治社會的背景，中國過去社會爲小農業的生產，政治爲封建的形態，這時所特別注意的則爲治術問題，根據治術的出發點，政治與教育便雙管齊下，政與教互相協調地官師合一、仕學合一、訓教合一的施行其政教合一的教育。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意識形態便適當地投契儒家的明倫宗旨，使人分上下定名份；又投契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明天理人欲的關係。這是經過長期封建政治薰陶下的中庸思想，這種思想，又是建築在小農業社會之上，更能穩定於政教合一制度之內的施行，所以我們如想明白書院制度之政治、社會背景，必須明白其當時社會上層意識形態所產生之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中，學校之課士宗旨是明倫，是掄取治術的人材，但卻沒有教士之實。書院制度之興，是由私人講學而起，其講學是補學校所不逮，講學宗旨也與學校一樣，並沒有什麼衝突。因此，對政治上言；它爲協調政治的工具；對社會上言，又爲士子講求心性或參加政治的進身之階，故直能適當地保持其悠久的存在。後至明代理學門戶太顯明了，書院講學，往往標榜政治，起

了衝突，方受禁毀。清代之初，也遭同一命運。

總括來說，書院制度本身之產生，既然決定於政治、經濟、社會之背景，但同時書院制度產生之後，亦可以影響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去：

(一) 提倡講學風氣 |廣東自南宋創建書院後，講學風氣漸盛。迨至明代，湛若水、霍文敏、薛中離等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或開講，或創建，使書院發達與學術昌明成一正比。考宋明理學所以特別發達，一方面固然因它本身價值有擴大的可能性，而一方面還因爲它有宣揚的憑藉之所，足以養成風氣。因此在清以前，書院之升降與理學之升降是互爲因果。他們山林派的講學，純然棄富貴，主修養，居敬窮理，養出端倪，讀書態度，在教育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而且自這種風氣一開，無論官吏逸士，都競以開堂講學爲事。像湛若水在廣東到處立書院講學，學子坐無虛席，皤然白叟年紀甚高者亦列爲弟子。而李材爲嶺西兵備僉事，亦到處設書院以開講其止修之旨。周鼎石以參藩入粵，按部至惠州，曾假天泉書院以闡明其道一之論。這可知當時講學之盛況。更自清代以後，書院愈發達，講學風氣亦愈普及，山陬海澨，弦歌不輟。像南雄知州謂：『余來南雄，甫下車課士至院中，瞻院宇之壯麗，園林之幽曠，享池之軒豁，而生徒衆多，踴躍濟濟，不禁喟然嘆矣！』(註五)而雷州知府，亦謂：『由是學徒敬業樂羣，士風寢昌，科第簪纓，文章氣節之士，連鑣接軌，與嶺東風物等矣。』(註六)至於香山知縣更謂：『自是以來，學者彰隨雲集，合附課者三百二十餘人，每當公餘夜靜，絲誦聲發齋廬，側耳東風，未嘗不爲之躊躇志滿；及閱所課文，亦漸斐然可觀矣！』(註七)這樣看來，書院創

興，足以提倡講學鼓勵讀書之風氣，很關重要的。

(二) 樹立社會清議 宋明書院山長，多爲名師宿儒，或在籍或致仕之官吏，身份既然有相當地位，舉止語默之間，對社會有相當表率。而且他們所開講的多是理學——天理人欲，分別善惡，這樣給與士子的端趨，而由士子又給與一般社會的端趨，因此無形中便隱爲社會正義的標準。同時由官立的宣講聖諭式的書院，每月朔望，官吏到院宣講，也無非爲孝、弟、忠、信之規儀。而書院之祀先賢，更寓有樹立先正訓教的意義。社會正義標準既然有些確立，不成文的法規也有相當維繫，所謂：『公是公非，同評月旦；言慈言孝，共樹風聲，上以體同風一道之休，下以安食德服疇之習。』（註八）如果違反這樣的名教，就難逃當時的清議了。故清季各地鄉約式的書院，爲祀儀率訓，練團敦睦，事實上爲地方政治之中心。明代書院，更標榜政治，東林首善，已有顯例。廣東似乎找不出這種性質書院，但既然爲倡導名教，講求道學的地方，士子的議論，差不多爲民意的代表。官吏如果奸邪惡惡，書院輿論便起。所以明代權臣，主張罷禁書院的，往往認爲結黨遊談，以倡邪說僞學目之。清代書院，雖然爲官立性質，對朝廷絕對不敢非議，但在社會輿論方面，其勢力也與宋明的書院一樣。

(三) 培植學術中心 清代以前書院，屬於私營者多，故講學很自由，往往以自己的學旨，分立門戶，培植其學術之中心。廣東在宋代學術中心地爲羅浮，明代學術中心地爲西樵、羅浮及潮州之宗山，尤以西樵爲盛，這正因爲書院多集中於那些地方的緣故。因爲書院集中，於是冠蓋往來從遊者衆，像當時西樵四大書院，名士如雲，人材踰濟，各習師承，互倡其心性之旨。其餘如龐弼唐的天關之

期，何維柏的廣孝之會，都是爲講明道旨，培植其學術中心的。又如清代各大書院，名師學旨，仍以關、閩、濂、洛爲宗，故清中葉以前廣東理學，還未息滅。道光以後，阮元學海堂的樸學風氣便興。光緒十五年張文襄創廣雅書院，大倡實學，於是士子治學風氣又轉移了。這可知書院在前代實具有轉移學風的權威，而爲學術中心的所在。

(四) 造就治術人材 前代教育，純以治術爲目的。宋、明書院，雖然專講理學，但也無非期爲明體達用。並且儒家政教合一的道理，仕學原屬一致。書院既然爲學術的中心，自然有治術人材的造就。元、清兩代書院，爲官立性質，其目的爲治術人材造就的居多。尤其在清代，士子未出身之前，多爲書院之肄業生。書院月課與學政歲試的課題相銜接，準備肄業於書院的士子，培養其應試的能力。另一方面，家長送子弟入書院肄業，也爲預備其應試。因爲應試就是到治術去的唯一路徑，故書院一切設施，都以準備應試爲目標，使『肄業於是者，息遊有地，董勸有資，樂羣砥礪之餘，果能當身體驗，能自得焉，將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註九)因此之故，像晚清需用治術人材愈複雜，故廣雅書院課程，逐漸傾向於專門化，經、史、理、文，分爲四科，不比從前那樣簡單了。明代方正學有言：『立教有四：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後兩者言工具，而前兩者言目的。書院課士，也是一樣。故『書院簡士之文行兼優者讀書其中，所以樹人儲材，宏萬世太平之基』的。(註一〇)

(五) 儲藏經籍之府 唐代書院之初興，原爲校書藏書的性質。北宋太宗真宗之世，凡建書院，

有司必表請賜書，所以書院的名稱，其義原爲藏書之所，而令士子就學其中的。清初乾隆年間，曾詔頒賜經籍於各府縣學宮及書院，取義也是這樣。書院裏面常有尊經閣藏書樓等，都是當時儲藏經籍的地方。因爲從前印刷未甚發達，士子常無力購書，而富厚之家每吝而弗求，假使有的，子弟又蓄而不觀，因此利用書院經籍供給士子讀書的需求，對於普及教育是很大的。並且當時經費充裕的書院，還有刻書的版本，像晚清學海堂、菊坡精舍、廣雅書院等都有設備，尤其廣雅書院設有廣雅書局，重要圖籍之印刷既多，修治文獻之助益更大。過去文獻之保存與延續，靠書院的功用是不少的。

總之，書院制度自有時代的價值。我們想明白書院存在的基本條件，必須了解近古時代所需要書院的意義，與了解書院本身價値能够存在的意義。像上面說過，所謂近古時代所需要書院的意義：

- (一) 爲補救學校制度課而不教的缺點；
- (二) 爲講明正學以期達政教合一的效用；
- (三) 爲培養能够應試掄選的人材。

而書院本身存在的價値，便由這種意義上體認出來，所以能够七百多年悠久的時期中延續下去。同時書院的沒落，也正因爲時代所需要書院的條件已經喪失，書院本身價値不能繼續存在。凡事其外在環境變動時，原有價値的背景已換了動向，於是更有某種較爲適應新環境之再價値的對立，在這新陳代謝作用過程中，書院制度便跟着衰替而沒落了。